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
有两次与江西结下不解之缘



7

2/1

江西是邓小平蒙难的地方，
也是他重新掘起，
再造辉煌的起点。

中共党史出版社

K82/
WRZ/1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主编 危仁晷

副主编 罗炎卿 桂玉麟 黄益姣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0034955

责任校对 邹祖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2

ISBN 7-80136-096-6

I. 邓… II. 中… III. 邓小平-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2619 号

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62581570 传真:(010)62581532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375 印张 170 千字

199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2 月北京第 2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 册

ISBN 7-80136-096-6/K·84

定 价:13.00 元

前 言

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他是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不仅领导我们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深重灾难中走了出来，而且还以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深刻了解，为党和国家重新走在时代潮流前面，为中华民族以更强大的力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规划了崭新的和切合实际的宏伟蓝图。他立足中国大地而又面向世界，正视国情现实而又放眼未来，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高瞻远瞩地构思和设计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整套发展战略。他在领导我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进行艰辛的锲而不舍的理论探索，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进入了新境界，达到了新高度。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曾在江西战斗、工作过。在这期间，他有顺利的发展，也经受过严峻的考验。他曾因坚持正确的主张而受到错误的打击，在江西经历了 he 革命生涯中艰难、曲折的时期。邓小平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过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出色地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地方政权建设，建立巩固的红色区域，支援革命战争，建树了卓著的历史功勋。但他又因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抵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遭到错误的斗争和处分。然而，他仍然对党襟怀

坦荡，忠心耿耿，忍辱负重，任劳任怨，继续坚定地履行他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应尽的义务，继续在革命斗争崎岖而又艰难的道路上奋进。以后他在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机关报《红星》主编。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文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被扣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帽子，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押送到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危难之时，他矢志不渝，坚贞不屈。除了参加劳动，他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和古今中外的书籍，以后并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在深深的思考着，从1969年10月至1973年2月，他在江西度过了五个年头的艰难岁月。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始终坚信党和人民会作出正确的选择。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定信念、智慧、魄力和威望，以在长期革命斗争和建设中所建立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和爱戴。

人民爱戴邓小平，邓小平与人民心连心。他时常惦记着江西革命老根据地的父老乡亲，关心着江西的山山水水。新中国建立后，他对红色故土一往情深，多次到江西视察工作，多次为江西题词，缅怀中国革命的光辉历史，勉励江西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建设好江西。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结束南巡途经江西时，特地在鹰潭停留，对江西的工作作了重要指示，鼓舞和激励江西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争取更大光荣。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我们党付出了巨大代价获得的极为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人民进行新的历史创造的科学总结，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传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针。为了

帮助人们了解邓小平漫长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光辉革命生涯,学习邓小平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他的战略思想、理论观点、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学习他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锤炼出的鲜明的革命风格,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做好党史资料征集、整理、编纂和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指示,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将现已征集到的史料加以整理选编,特编纂了《邓小平在江西》一书。我们怀着对邓小平崇敬和爱戴的心情,力求本书能从几个不同阶段反映邓小平同志在江西战斗、工作和生活的若干侧面,使人们从这位领一代风骚的伟人身上,吸收丰富的政治营养。

《邓小平在江西》一书收录了散见于其他报刊图书中有关邓小平在江西工作和生活的文字史料,也有新整理的资料。书前收入邓小平在江西活动的照片,书后附录了邓小平在江西活动的大事记,供读者参考。鉴于我们收集选编的史料有限,加之水平不高,难免有遗漏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和专家指正。

在本书的编纂中,有关地、市、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提供了部分文字和图片资料,李新华拍摄了一部分图片和全部图片翻拍、洗印。刘端秤、章志红、胡小珍、王天照、萧丹、熊华也参加了部分工作。在此对他们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

本书于1994年11月第一次印刷出版。如今为缅怀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邓小平同志,特再次印刷、并更名为《邓小平在江西的日子》奉献给广大读者。

编 者

目 录

图 片

前 言..... (1)

1931—1934:邓小平在中央苏区

-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 毛 毛(3)
- 红七军在崇义的活动 黄志勇(38)
- 邓小平在崇义 中共崇义县委党史办(40)
- “棉里藏针” [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50)
- 邓小平和他领导的会昌中心县委
..... 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工作办公室(56)
- 在中央苏区 李维汉(79)
-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批判 曹仲彬(82)
- 回忆跟邓小平同志在中央苏区的一段时光 钟亚庆(94)
- 邓小平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贡献 余伯流(99)

1961—1992:邓小平在江西

- 邓小平在庐山..... 尹超海(117)
- 在江西的日子里..... 毛 毛(126)
- 回忆邓小平在江西新建的一段日子

——访问罗朋谈话录	熊 敏 梅 颢(134)
初访井冈	史爱国(139)
情归中央苏区	高继民(148)
邓小平樟树之行	皮端森(156)
邓小平对陶瓷工人的关怀	凌至葆(160)
复出前夕过鹰潭	万诗平(162)
播下春风万里	
——邓小平 1992 年 1 月 30 日在鹰潭谈话纪实	危仁晟(168)
周恩来与邓小平在 1973	铁 骥(178)

邓小平的故事

为民谋利的县委书记	刘 良(195)
群众的贴心人	邹书春(199)
书记带头搞优抚	萧成锦(201)
肩负党的重任来会昌	杨衍芬(203)
问病床前	中共会昌县委党史办公室(205)
一杯清茶	严修余(207)
“吃红米饭闹革命前途无量”	杨衍芬(208)
暗 访	严修余 谢镇祥 杨远芬(210)
“调查清楚再处理!”	甘 洁(212)
裤子越穿越短	刘 良(214)
邓小平在江西大事记	(217)

邓小平在中央苏区^①

毛 毛

瑞金与中央苏区

1931年7月中旬,父亲和阿金两人由上海上船,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了交通站,即由交通站派一广东同志带路,径直北上,经广东边界大埔,顺利地进入福建的永定,这里已经进入中央苏区的地界。然后,他们再向西北经上杭、汀州(长汀),最后向西,跨过闽赣边界,到达江西的瑞金。

这时已是1931年8月间。

瑞金,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27年8月南昌起义失败后,9月,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后,毛泽东认为,目前攻打中心城市不可能取得胜利,应把部队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保存力量,继续坚持斗争,以发展革命力量,并决定向湘赣边界的山区进军,在湘赣交界之处的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和军队要把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根据地三项任务结合起来。而井冈山地处江西、湘南之

① 原载《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8月版。标题为编者所加。

间，远离敌人中心城市，且山势险要，易于攻守。这个地区曾受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影响，地方群众基础较好，还有中共的地方组织和地方群众武装，最宜作为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开创，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成为武装夺取政权的一个伟大转变的起点。

1927 年底到 1928 年，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广州起义部队和彭德怀率领的平江起义部队相继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功地在井冈山开辟了一片革命的区域，并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

1928 年 4 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经中央批准，决定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即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全军下辖三个师九个团，共一万余人。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恐慌。1928 年底，敌人成立了湘赣两省“剿匪”总部，纠集了二十五个团，约二万余人的兵力，分五路向井冈山猛扑。

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929 年 1 月，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红四军三千六百人的主力开始向赣南转移，留彭德怀率红五军等留守井冈山。

2 月，红四军攻占赣东南的宁都，此后由于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将湘粤赣三省军队抽调到武汉地区，闽赣境内空虚，乘此机会，红四军先进闽西，再转赣南，连克闽西长汀，赣南瑞金、于都、兴国、宁都等县。到了 6 月，红四军在赣南、闽西边境进行游击战，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相继建立了十多个县的红色政权。

1930 年，红四军打退了敌人的“会剿”，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又打通了赣、闽、粤三省红色区域的联系，解放了赣南大片土地，建立苏维埃和土地革命等各项工作蓬勃开展。1930 年初，

闽西革命根据地已扩大为拥有八十五万人口、纵横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八十万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分到了土地，各县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

1930年6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红四军前委将红四军、红六军等部队整编，成立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红军在赣南、闽西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形成了比较巩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又称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掉转头来，集中兵力，“围剿”他的心腹之患，红军。国民党军十万部队，于11月间开始向我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朱德采取了机智灵活的战略战术，先是诱敌深入，而后中间突破，接着各个击破，到12月30日，全歼敌军九千余人，活捉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蒋介石经此惨败，并未罢休，狂妄地叫嚣要“三个月内消灭共军”。1931年2月，蒋介石令何应钦带队，调军二十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制定了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红军三万余人，经过十五天的激战，横扫七百余里，打了五个胜仗，缴枪二万余枝，痛快淋漓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蒋介石闻讯气急败坏，立即又于1931年7月，集中三十万兵力，亲任总司令，还带着德国的、日本的和英国的军事顾问，坐镇江西省会南昌，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三次“围剿”。

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毛泽东提出“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采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方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声东击西，巧妙回旋，使得敌人不知红军主力何在，成天疲于奔命地追踪，却

又屡遭红军主力和地方武装的袭击。经三个月的时间，敌军最后撤退，而我军则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枝。

蒋介石亲自出马督阵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就这么的失败了。

经过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赣南、闽西及周围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形成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的中央苏区。

蒋介石不顾民心，不顾国耻，“先安内，后攘外”的如意算盘，在坚不可摧的红军面前，彻底破产。

父亲到达江西瑞金是1931年8月，其时正是红军主力反击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刻。

瑞金是中央苏区的后方，父亲到那里后，发现瑞金县的党政领导权，已被反革命分子篡夺，许多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被杀害，仅瑞金县城对面的一个山上就有百余人被杀害，群众情绪很大，干部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这时，在红军工作的谢唯俊正在瑞金，由上海党中央派到中央苏区工作的余泽鸿也到了瑞金。当时他们与上级还没有建立联系，他们和邓小平一起商议，推举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

在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邓小平和谢唯俊、余泽鸿二人，首先迅速地惩办了反革命分子，为被冤屈的革命干部平了反，然后召开了县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了红色革命政权，并着手发动群众。不久，瑞金的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发挥起来了，特别是大多数本地的农民干部情绪很高。有了大批的群众和与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的支持，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在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中华苏维埃的政权中心迁到瑞金，瑞金由此成为享誉全国的“红都”。

为了庆祝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红都”瑞金召开了五万人的盛大祝捷大会。父亲说过，由于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有扩音设备，因此大会分设在四五个会场。父亲是大会的主持人，他曾

陪同毛泽东到各个会场讲话。

那种庆祝胜利的场面，真是红旗标语如海，口号欢呼鼎沸，整个瑞金一片革命热情高涨。

有了在广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地方工作的经验，使得父亲在瑞金的工作进行得得心应手，十分顺利。

对于在瑞金的这一段经历，时间虽短，父亲却常常提起。1992年的一天，我们全家在吃饭，我弟弟六岁的儿子小弟饿极了，吃得狼吞虎咽的。看着小孙子这么能吃的样子，爷爷笑了，他说：“我们在瑞金工作的时候，搞土地革命，制定分地的政策。有人说小孩子不应该分地，我就对他们讲，四川俗话说，三岁小子，吃死老子！小孩子吃得也不少呀，因此也应该分地。后来他们接受了我的意见。你们看，小弟不就是三岁小子，吃死老子！”我们都笑了，我对父亲说：“应该是六岁小子，吃死爷爷！”

父亲肚子里的故事一定还有很多，很多，就是他太不爱讲述自己的过去了。如果他能像这次这样多讲点儿，我就可以“多捞点稻草”了，这本书也就可以更加生动一些了！

父亲在瑞金担任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时间。1932年5月，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将邓小平调离瑞金，到瑞金以南的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1972年秋天，父亲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被打倒后谪居江西时，他和母亲二人曾获准在江西境内“调查研究”。他们从南昌南下，先到井冈山，凭吊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遗址，后向东南，到瑞金、会昌、寻乌等地。这次到瑞金，离他在瑞金当县委书记，已时隔四十春秋有一之久。虽然他当时，还是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未复出工作，但江西老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给予了他热情的接待。瑞金县的同志对他说：“你是我们瑞金的老县委书记！”这句话曾令父亲感动不已。在他蒙冤遭受

打击的时候，老区人民还惦念着他。

在中央苏区进行第三次反“围剿”的时候，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逐步推行到中央苏区和其他各革命根据地。

1931年6月，“左”倾错误统治的党中央给红军及各地方党组织发出训令，说由于反动统治的政治危机继续增长，革命力量逐渐发展，当前党的紧急任务是力争在一省或数省的胜利，实现湘、鄂、赣三省打成一片的苏区。这个训令，就是要红军不顾现实状况地去攻击比我们力量强大得多的敌军，把整个的湖南、湖北和江西都变成苏区。

九·一八事变后，党中央又错误地决定，革命时机正在全中国成熟，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前途在望，红军要不给敌人喘息机会，集中力量追击敌人退却部队，取得一两个中心的或次要的城市。王明中央还气势汹汹地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加深与组织上的巩固，是实现上述任务的必要前提，目前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犯有“左”倾错误的领导者在组织上发展了宗派主义。对于那些对“左”倾政策怀疑、不满或不积极拥护和坚决执行的人，一律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并对这些同志在组织上和人身上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使用对敌人的斗争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

1931年4月，上海的党中央派出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中央代表一到中央苏区，就像太上皇一样发号施令，横加指责。他们劈头就指责，红一方面军的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最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斗争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在巩固革命根据地、红军、土地、党政关系、工人运动等问题上，中央都对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加以斥责。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在中央代表团的把持下，“完全同意”了中共中央对中央苏区工作的“批评”。会议指责中央苏区在根据地、红军、土地、政权、工会运动、反帝运动、共产党与共青团、肃清一切反动派的斗争方面犯有“错误和缺点”，指责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是“富农路线”，犯了“向地主豪绅及富农让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责毛泽东不去建立真正的工农红军，认为红军还没有脱离“游击主义的传统”，攻击中央苏区的肃反工作“有很大的错误”，致使“群众没有发动”，“反革命组织满布于苏区”。会议还十分错误地要求在党内开展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在红军的问题上，会议强调必须“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会议最终排斥了毛泽东等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工作的正确领导。

与此同时，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选举毛泽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

本来，这是一次群英聚会，庆祝胜利的盛会，但在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这次会议以错误的“阶级路线”为原则，规定地主“没有分配任何土地的权利”，富农“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等等过“左”的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左”的高压气氛，使这次大会蒙上了一层不可名状的阴影。

父亲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上他认识了许多苏区的同志，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铁路工人出身的红军将领“王胡子”王震。

父亲还说过，在这之前的一次大会上，他曾远远地看见了李明瑞。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相见，本应令人十分高兴和激动，但是，父亲知道中央对自己的不悦，又鉴于那时的“左”的气氛，为了不影响李明瑞，父亲竟然没有上前去与李明瑞打招呼。他们二人，只是远远

地相望了一下。这，也是父亲与李明瑞见的最后一面，后来，李明瑞终于没有逃脱“左”的魔掌，含冤被杀。

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的制定，给中央苏区的各项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性。而这些错误的决定，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抵制。

从此，中央苏区的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广大干部群众，一方面要面对敌人的强大军事进攻，另一方面又要与“左”倾错误路线相抗争。

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的命运，经受了一系列险象环生的重大考验。

第一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1932年5月，父亲奉江西省委之命，调往会昌担任县委书记。

会昌，在瑞金以南五十公里，与瑞金紧相毗邻。1930年4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来到会昌时，在这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和建立了中共会昌县委。在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后，会昌县农村许多地方已属红色区域，但会昌县城则仍是一个白点。1931年11月，红三军团攻克了会昌县城，12月，成立了中共会昌临时县委。1931年底，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这时，会昌全县已有党员六百六十人，区委十个，党支部六十六个。1932年5月，古柏调任江西省裁判部长，父亲由此到达会昌，领导会昌地方党政军工作。

父亲一到会昌，几天之内，首先处理了排除敌人“靖卫团”骚扰的事情。其时，由于会昌县城刚刚解放才几个月，城外一些小股的国民党地方“靖卫团”和散兵游勇，经常向城内放冷枪，并四处骚扰群众。父亲主持召开了会昌各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决定

加强巡逻和搜索，并派出赤卫队继续清剿“靖卫团”的残余，从而稳定了局面，保障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邓小平在和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等研究工作时提出，会昌是江西的重要门户，离“红都”瑞金只有五十公里，又是一个大县，有十四、五个区，应设立一个军事部，以适应斗争的需要。经罗屏汉介绍，决定由原红十一军独立团副团长钟亚庆出任军事部长。钟亚庆担心自己没有文化，怕不适应工作，在邓小平几次电话催促下，他才背起背包，步行到会昌。

钟亚庆回忆道：“碰巧，当我走到会昌县杉塘区苏维埃住址时，突然遇到邓小平同志，他一见我就问：‘你这个同志，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姓什么？’声音很大。

“‘从澄江来，叫钟亚庆，到会昌去。’

“‘你叫钟亚庆，好啦，我是邓小平，走，到杉塘区苏维埃去坐坐。’

“我向邓小平同志行了个礼，跟着他走到在大河排顶上的杉塘区苏维埃。苏维埃主席接待我们喝了茶。小平同志用带有批评的口吻对我说：‘你好调皮，老罗打了好多电话给你，你还不来。我又打电话批评罗贵波主任，你现在才来。你看看！’他手指着墙壁上挂着的文件说：‘你任会昌县军事部长，文件都发了，你还敢不来！’接着，邓小平同志把话题一转，说：‘你不要走，今天我到罗塘区，你跟我。’

“我跟着小平同志，一路步行，到了罗塘区苏维埃。晚上，小平同志叫区委、区苏维埃领导开会，布置了扩大红军等任务。第二天早饭，区委领导款待我们吃猪肉，记得吃饭时，小平同志对区委书记说：‘猪肉，好是好，就是少了一项。’区委书记问：‘少什么？’小平同志直率地说：‘辣子！’区委书记即起身去寻找，很快就抓了一把新番椒回来。小平同志拿了一个放进嘴里咬了一口，说：‘不太辣，